

●记者 甘苦谈

JIZHE

GANKU

TAN

李普／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记者甘苦谈

● 李普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记者甘苦谈

李普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5,000 印张：7.375 印数：1——5,750

统一书号：10109·2025 定价：1.15元

湘人：86—1

序

大学办新闻系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了报考的热门。还出现了几所刊授或函授的新闻大学，动辄好几万人。我接受了几处的聘书，两种类型的都有，一时不可能都去讲课。献上这本小书，打一通边鼓吧。

一九八二年我将要离休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建议我写一本新闻基础理论或教程之类的书。他们知道我有一些想法和意见，喜欢讲这一行的特性，讲记者的地位以及新闻的捕捉和写作等等。我慎重考虑了这番不约而同的好意，他们对我的期望使我十分感动，但是对我的估计却未免过高了。

真要写那样一本书，有些问题我还要从头研究；特别是还必须要有充分的例证，而我平日却完全没有积累这方面的材料。新闻这一行本来十分引人，如果我勉强写出来，结果叫人打瞌睡，岂不太煞风景！此外，写那样一本书，首先要花功夫构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有些众所周知的东西也不得不重说一遍。我想，与其那样地使用我已经很有限的精力，不如面对现实，先说我认为最必须说的话。

想什么说什么，做交心之谈，对读者或许也较为切合实用和比较轻松易读。我热望能够如此。

两年多以来，有些新闻单位和院系邀我讲演，我就抱定这个主意。即使人家出了题目，我也总要扯到我认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上来。有的题目在好几个地方重复讲过，这里收的只是某一次的某一部分；有的在写到纸上的时候却大大扩充了。

有两篇是在工作岗位上的讲话。其中之一是关于十年浩劫给新闻工作带来的问题。那些问题至今还常有残迹出现，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鉴往可以知来；对如今，也是有用处的。

这本书里还收了几篇给别人的书写的序言。这些差使，我是万变不离其宗，是作为借题发挥的机会而接受的。这样，难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为了不致于太离谱，我还是不得不先读那本书。此外，还收了我自己的书的后记。这些后记，除了交代必要的背景，也乘机发表一点意见。因此，这些序跋在编入这本书的时候，都另做了一个标题。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这么办的，特此加以说明。

作 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牛年第三日

目 录

记者的修养——德识学才	1
为什么短不了	19
打锣卖糖 各有一行	30
艰苦的行业	38
高明的宣传家	42
用事实说话和舞文弄墨	50
新闻总是有选择的	58
社会新闻的价值	67
关于针对性	76
生动和朴实	109
写出个立体来	113
记者的基本功	116

题材的份量.....	122
新闻的容量.....	128
有必要从A B C讲起.....	130
他们走在正路上.....	171
开拓者的道路.....	181
一种独立的存在.....	190
“但开风气不为师”.....	201
“润物细无声”.....	219
思想性第一.....	221

记者的修养——德识学才

记者或者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可以列十条八条，我想简化为四个字：德、识、学、才。

我欣赏“修养”这个词，因为它有别于某种职业技能的学习。千万不要把新闻记者这个工作看成一种技术活，看成某种谋生的职业。千万不要把为从事这个工作所作的必要的准备，只看成某种技能的学习，看成某种职业的培训。当然，无论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它独特的要求和技巧，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把这四个字这么排列，是有点儿考虑的。在我看来，德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其次是识；再次才是学和才。这不是说学和才不重要。学和才本身就是重要的，拿才来说，有采访之才，有写作之才，两者都很重要。哪怕你德很好，见识也很高，但你不善于采访，拿不到东西；拿到东西，又表达不出来，那是成不了一个好记者的。我曾经把“学”列在最后，现在提到“才”之前。因为我越来越感到，我们——包括我自己，最普遍的问题是学问不够，知识太少。这是理由之一。理

由之二是，无论德、识、才都有赖于学。这点后面还要讲到。这四个字，既有轻重之别，又是紧密关联，不可分的。

这里主要讲前两个字——德和识。因为德、识最重要，又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相当普遍的现象是只注意才、学，有些青年朋友甚至只知道要学习写作技巧，结果象《水浒》里的九纹龙那样，开头只学了些花架子。眼看着他们走弯路，浪费青春，我觉得很不安。

—

先讲德。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德，历来重视道德修养。我们党也是如此，我们党过去使用干部的标准叫做德、才、资，德摆在第一位。现在，讲干部四化，第一是革命化，革命化就是德。

我们所讲的德，比古人讲的德要求更高。有许多古人强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但它主要讲的是个人道德的修养。我们也强调个人品德，更强调政治品德，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和坚定性。在刑场上，在战场上，在十年动乱的大风大浪中，乃至十年动乱以后，有的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动摇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革命战士，却始终坚定不移，这在我们看来是德的最重要的内容。政治品德也同个人品德有关。无论个人的为人处世或是政治方面，有德之士都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所以，我们强调政治道德，绝不是看轻个人道德。

清朝有个历史学家叫章学诚，他强调“史德”，讲的是著

书者的“心术”。他说，心术不正的人，“不足以言史”。这很对。对我们新闻记者，德的问题不解决，不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足以谈当记者，当人民的记者。但是，我们古人脑子里德的哲学基础基本上是唯心论的，不是科学的，往往是做不到的。有的人甚至不准备真正做到。比如仁，仁者爱人，爱一切人。在我们看来，这在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奴隶社会，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根本不被当作人看。在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界线十分森严。我们讲的德，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不是发自内心的许诺，而是科学的结论。世界观决定人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如国家观、社会观、人生观、恋爱观、家庭观、是非观、善恶观等等。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不认识这三个字的人也如此，不过他的世界观显得混乱，很不一贯罢了。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

现在从我们新闻记者这一行，拿两个具体问题来讲一讲。

一个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做别的工作，固然也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新闻记者，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做别的工作可以不碰到的问题，或者碰到了可以不表态的问题，我们却天天要碰到，要表态，要考虑动不动笔，怎样动笔。可见新闻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想不妨这么说：一个党委书记每天要碰到的重大问题，一个新闻记者差不多每天也都会碰到。我们的岗位在时代前进的最前沿，和政治活动家的岗位很接近，实际上记者也是政治活动家。所

以，如果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以说一天也干不下去。而这个一致，不可能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自己骗自己，也不是赌咒发誓所能解决的。俗话说，混过了初一，混不过十五，有矛盾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只有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才能真正弄懂中央的方针、路线，领会和承认它的正确性。于是乎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便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还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所谓“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的说法。意思是说采写新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值得去干。这种论调我是最近才听到的。

所谓“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有对的一面，可以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只有努力去争取这“一天的生命”。如果相反，由于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就看不起它，不愿意、不高兴去采写这种东西，那就不对头了。我以为这是出发点的错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显姓扬名，不是要自己的作品传之后世。我们的出发点是为现在，为振兴中华，为读者服务，为党和人民服务。现在许多记者看不起短新闻，喜欢写长通讯，而长通讯又用小说的手法。这股风相当的大。现在各报都在注意报道先进人物，这些人物的报道有愈写愈长之势。但是，你写得再好，读者没有时间看，岂不是白费劲。新闻记者的职责首先在于用最短的篇幅，告诉读者最重要的新闻。我们知道读者很忙，每天能用于看报的时间不多。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写得简短，写得扎实，写得精彩，写得美，千方百计地争取读者读我

们的东西，接受我们的服务。我们采写这些东西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事业，你接受了我们的服务，同时也就可能接受这种影响。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我是以此为荣呢，还是以此为耻呢，还是以此为无所谓、不足道、无价值可言呢？这就和世界观有关了。

这两个问题又涉及感情问题。记者作为观察家，作为调查研究者，既要十分冷静，又要充满激情，才可能跟踪追下去，打破沙锅问到底，把一件事弄清楚，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又总是企求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能动人，从理智上和感情上打动读者。如果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记者自己都无动于衷，怎么能打动别人呢？在这里，理智和感情是一致的。我们和党与人民，利益和思想相同，喜怒和哀乐相共。不具备这一条的人，我敢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不正是世界观的问题吗？不正是德的问题吗？

二

前面粗略地讲了讲德的重要性。下面讲讲怎样提高德的水平，讲讲革命化怎么化法？

最要紧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体系，而科学，不加以钻研是不可能领会和掌握的。过去有些同志很强调、很看重工农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但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够的，免不了要犯错误。免不了迷失方向。因为事物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复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知识，但是千万不要把它仅仅当作知识，而应该把它当作思想行动的指南，使自己来一个“化”。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来这样一个化。说书读得越多越蠢，这是错误的。确实有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而变成了修正主义者，甚至变成了特务的。这不是书读得太多之过，而是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群众。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化”是一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终止，不可能终止的过程。周恩来同志说，一个人要工作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改造到老，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指导自己来适应和处理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不能停滞、不能僵化，不能落伍。我们在作记者之前，在世界观的问题上，一定要有个基本的解决，或者说某种程度的解决，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如果青年朋友中间至今还有对“三信”的问题，对“新闻只有一天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的，也不要紧，只要努力去解决就好。大家可能知道刘伯承同志入党的故事。吴玉章、杨闇公同志是最初建立四川党组织的人。杨很早就牺牲了，从他留下的日记中知道，他非常钦佩刘伯承同志。他好几次讲刘是天才，是人才。“但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可是当杨找他谈入党问题的时候，刘伯承同志说，现在我对各派学说还缺少研究，我还要好好研究一下，才能确定我自己的方向。杨闇公同志对此佩服得不得了，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刘真是个严

肃的人，认真的人，赤胆忠心的人：这个人跟一般的随波逐流、赶时髦的人完全不一样。杨闇公同志的日记一方面表现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最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能说服刘伯承同志；另一方面，也相信象刘伯承同志这样的人，一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果然，两年以后，刘伯承同志仍然在吴、杨两位介绍之下入了党。经过两年的探索，他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这几年青年人思想的情况和变化，我略微知道一点。有许多人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党，深信不疑。后来，渐渐产生了怀疑，甚至由动摇走向否定。这样，便到西方的思想中去找真理，找答案，找武器。有一段时间，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某些大学生当中风行得很。他们继续探索、寻找，拿马克思主义来比较，自己和自己辩论。他们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重新肯定：唯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个圈子绕得好，是好事。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形的上升，水平更高了，更扎实了。确实，光读马克思主义也不行，经不得风吹浪打。可以说，不懂得唯心论，很难真正懂得唯物论。只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最终总是会找到马克思主义的。

我想强调的只是，作为一个记者，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道德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掌握得越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如果背道而驰，迷途不返，我就要用章学诚那句话，“不足以言史”。道德败坏固然不足以当记者；即使为人私德很好，也成不了一个

出类拔萃的好记者。

三

下面谈谈识。

识是什么？识见，见识。农村里现在有不少专业户劳动致富的，他们有某种本事，比方会养蚯蚓，会养毒蛇；可是更重要的是他有见识，他看准了。在我们这一行，新闻敏感，政治敏感就属于识的范畴。一件事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价值在哪里，这价值是小还是大，该不该报道，早报道还是晚报道，这样报道还是那样报道，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新闻单位的领导，这些问题天天都要碰到。不过，水平高的，熟练的，很快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作出决定。但他脑子里是经历了一个思考的过程的，那怕只费了几秒钟。这就是识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快慢之差，还有对错之分，又还有深浅之别。

我们古人最初把识、才、学连在一起讲的，大约是唐朝的大史学家刘知几。有人问他，自古以来写文章的甚多，研究历史的甚少，为什么？刘知几回答：“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见之，故史者少。”他认为，世界上很少同时具备才、学、识三种长处的人。他后头还接着说：如果有学问而没有才，就等于一个愚蠢的商人，有很多资金，却不会经营，结果不会获得利润；如果有才无学，就好比一个很有本事的木匠，而没有工具，没有木料，结果也起不了房子。刘知几没有讲德这个字，不过多少也含有这个意思。他强调“善恶必书”，对帝王和大臣们所做的重大事情，不论善恶，史家都要秉笔直书。

书，使“骄君贼臣有所知惧”。

唐以后，论才、学、识的人不少。到了清代的章学诚，才强调史德，前面已经讲了。他有一段话，把识学才三个字连起来讲，讲得很好。他说：“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这段话讲了才学识三者的关系，我认为很值得仔细体味。他强调学，更强调识。一则说，“学贵识也”，再则说：“小慧无识，是为不才。”意思是，这个人看起来很聪明，很有才；但是没有见识，没有见解，只不过有点小聪明，小才气；其实还是“不才”，还是个无能之辈。我们作为记者，哪怕有满肚子学问，善于活动，善于采访，笔头也过得硬，写得很漂亮，可是没有见识，能成个好记者吗？有人说俏皮话：“记者”二字是文言，翻译成大白话是“记的人”，别人说什么，你记什么。如果没有识见，那就真正只能成为这种可怜的“记的人”了。

“识”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可以这样说，就是思想政治水平，就是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

这样表述对不对，是不是准确，大家可以研究。现在迫切需要强调的是，究竟有没有“识”这个东西。照我观察，不少人虽然口头上常常说这个词，例如说某人思想政治水平如何如何，可是实际上似乎并不那么肯定确实有这回事。或者并没有列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有意识地去追求，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拿我自己来说，我这辈子进德修业，尽管成果很不理想，但是确实至今还在努力。有时，也有一些同志问我：“老同志，

给我们谈谈经验吧。”我说：“经验甚微，教训很多。”教训的第一条，就是对“识”觉悟太迟，没有及早地在这方面有意识地下功夫，做自觉的努力。否则我的工作会做得好些，出色些，错误会少一些。为了使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的教训，我想对“识”再加以描绘。

第一，善于区别事物或者问题的份量、大小，善于抓大问题。我们国家历史上名君贤相的故事多得很。比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个吕端。宋太宗叫他当宰相，有人说他糊涂，当不了。宋太宗说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成了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毛主席也这样评价过叶剑英同志，说叶剑英同志大事不糊涂。确实，小事可以糊涂，而且最好糊涂一点，但大事千万不能糊涂。毛主席也讲过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识见很高。这个评价十分正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展进步很快，快到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大家知道，关键是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怎样突破的呢？首先要归功于谁呢？这就要追溯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了。许多人不了解情况，以为放第一炮的是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的文章，其实不是，而是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七年五月间，他第一个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那“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即使是毛主席说的话，也未必每一句都对。这个问题提得多么高明！这种真知灼见，就是识。有这种本事，就叫做有识。邓小平